

# 論《朱程問答》的 編纂、影響與考訂作用

史 甄 陶\*

## 提 要

《朱程問答》是朱熹與程洵往來的書信集，其中保存朱熹寫給程洵的信件，以及程洵的回信。為了要瞭解這部著作的價值何在，本文分為三部分討論。首先探討的是此書的編纂背景。此書在明代由程氏家族的養子程資編輯，並且出資刊刻，其中最特殊的資料是家族中保存的先世遺墨，這批資料之所以受到重視，與程氏家族在明代刻意標榜以朱子學為家學有關。其次，此書為明代程瞳纂寫《新安學繫錄》中的程洵傳記，提供第一手的資料，並且，清代夏忻也利用此書中所保存的信件，提出朱學三變之說。兩人都是為著建構徽州地區的朱子學傳承歷史而作。然而他們對於資料的使用，仍有值得商榷之處。第三，由於此書中，收錄朱熹的佚文以及程洵的書信，因此能夠提供更完整的線索，考訂兩人論學書信的編年問題，說明朱熹與林用中及葉仁的交往過程，以及朱熹早年對於《正蒙》和〈西銘〉的觀點，進而對照出朱熹和程洵在思想上的差異。

**關鍵詞：**程洵、朱熹、朱程問答、程資

---

本文於 104.05.11 收稿，104.09.07 審查通過。

\* 國立臺灣大學中國文學系助理教授。

DOI:10.6281/NTUCL.2015.09.50.02

# A Study of the Compilation, Influence, and Documentary Value of the *Questions and Answers between Zhu Xi and Cheng Xun*

Shih Chen-Tao\*

## Abstract

The *Questions and Answers between Zhu Xi and Cheng Xun* records the personal correspondence between Zhu Xi and Cheng Xun, including the letters Zhu Xi wrote to Cheng Xun and Cheng Xun's replies. In trying to fully understand the value of this collection, this article is divided into three sections. First investigated is the background to the compilation of this collection. It was compiled and funded during the Ming dynasty by Cheng Zi, an adopted child of the Cheng family. One of the most interesting types of documents in this collection is the ancestors' manuscripts preserved within the family. These documents were highly valued because the Cheng family in the Ming dynasty put a lot of emphasis on Zhu Xi's studies as their family teachings. Second, the collection provided first-hand information for Cheng Tong's compilation of Cheng Xun's biography in *The Intellectual Lineage of Xin'an* in the Ming dynasty. Also, Qing scholar Xia Xin used the correspondence preserved in the collection to support his observation of three changes in Zhu Xi's theories. Both scholars made an effort to construct the heritage of Zhu Xi's studies in the Huizhou area, but how they used the documents has

---

\* Assistant Professor, Department of Chinese Literatur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

problems. Third, since the collection includes Zhu Xi's lost works and Cheng Xun's letters, it provides historical evidence for reconstructing the chronology of these scholarly communications. It validates Zhu Xi's association with Lin Yong-Zhong and Ye Ren, verifies Zhu Xi's earlier views on Zhang Zai's *Rectifying the Ignorant and The Western Inscription*, and reflects the ideological differences between Zhu Xi and Cheng Xun.

**Keywords:** Cheng Xun, Zhu Xi, *Questions and Answers between Zhu Xi and Cheng Xun*, Cheng Zi



# 論《朱程問答》的 編纂、影響與考訂作用\*

史 甄 陶

## 一、前 言

《朱程問答》是朱熹（1130-1200）及程洵（1133-1196）的書信集，由明代程資編輯完成。程洵，字欽國，後更字為允夫，號克庵，<sup>1</sup>徽州婺源人（今屬江西婺源），朱熹的表弟。程洵的父親程鼎，是朱熹父親朱松的表弟，曾赴閩從遊於朱松。<sup>2</sup>朱松過世時，朱熹年十四歲，曾寫信向程鼎報喪。<sup>3</sup>五年之後朱熹考

---

\* 本文發表於「北大、臺大中國古典文學與文獻學術研討會」，北京：北京大學，2014年11月21-22日。研討會時承講評者北京大學劉勇強教授，惠賜寶貴意見；修改期間，蒙楊祖漢教授、李瑞全教授、蔡家和教授、趙飛鵬教授、林勝彩博士、徐力恆博士、徐一智博士和吉田繪里小姐，提供精闢見解；復蒙二位匿名審查委員悉心指正，謹此深致謝忱。

<sup>1</sup> 明·程瞳：《新安學繫錄》（合肥：黃山書社，2006年），卷7，頁134。

<sup>2</sup> 元·汪幼鳳記載：「父鼎，朱韋齋先生內弟，少孤，與龜山門人羅仲素、蕭子莊數公遊。從韋齋學于閩。韋齋贈以六言，皆事親、修身、為學之要。鼎拜受其言，益自樹立，博覽經史，尤好讀左氏傳，為文輒效其體。不能屈意舉子尺度，以故不利場屋。韋齋嘗有『舅家今三世，筆研未逢秋』之嘆。家故貧，至鼎益困。中歲奉親徙居窮山間，自號韓溪翁。晦安先生表其墓。」元·汪幼鳳：〈程知錄洵本傳〉，收於宋·程洵：《克庵先生尊德性齋小集·補遺》，《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冊1318，頁183。

<sup>3</sup> 宋·朱熹：〈簡十四表叔書一〉，清·程蓉照等：《韓溪程氏梅山支譜》，卷1，頁70。譜上記載此封書信寫於「紹興十三年癸亥」（1143年）。此書目前藏於上海圖書館。

中進士，也向程鼎報喜，並在信中陳述福建家中的情況。<sup>4</sup>程鼎是朱熹與家鄉徽州聯繫的重要對象，所以對程洵也相當熟悉。兩人首次見面於宋高宗紹興二十年（1150），當時朱熹二十歲，因著考上進士，回鄉婺源省墓，程洵時年十七歲。自此之後，兩人書信往返，長達四十五年之久。對朱熹而言，程洵不只是他的表弟，更被他視為同志。<sup>5</sup>程洵曾被列於偽學之流，<sup>6</sup>然而他在宋寧宗慶元二年（1196）九月過世，隔年王沆奏請設立偽學之籍，<sup>7</sup>所以程洵不在黨籍名單之內。

程洵一生從未考上貢舉，五十歲時以特恩授信州文學，任衡陽縣主簿，再調吉州錄事參軍，後因偽學難興，所以不得出仕。<sup>8</sup>程洵的詩文由宗人程萬里和女婿黃昭遠等人蒐集，編為《尊德性齋集》十卷，曾請周必大和王炎為其作序。周必大標舉其學術宗旨為「和蘇程為一家」，<sup>9</sup>王炎則稱讚其文「大抵理勝而詞彩附之，陶鍊彙括，俱不苟作」。<sup>10</sup>然而這部著作，到了明代則殘破不全，僅剩三卷。<sup>11</sup>其中保存了程洵的詩和文，卻完全沒有收錄程洵寫給朱熹的信件。然而，目前藏於中國國家圖書館的《朱程問答》中，卻完整保存了朱熹與程洵往來的書信。因著程洵是朱熹與家鄉徽州往來最密切的親人，於是，這部著作對於今人了解朱熹與徽州親人在學術上和生活上往來的情況，以及程洵的理學思想，提供了豐富的線索。這些問題筆者過去曾經加以梳理。<sup>12</sup>但是

<sup>4</sup> 宋·朱熹：〈簡十四表叔書二〉，清·程荅照等：《韓溪程氏梅山支譜》，卷1，頁70-71。譜上記載此封書信寫於「紹興十八年戊辰」（1148年）。

<sup>5</sup> 宋·朱熹在〈祭程允夫文〉中說：「余生多艱，今復老病，中外兄弟，蓋亡幾人？有如允夫，尤號同志。」宋·朱熹著，陳俊民校編：《朱子文集》（臺北：德富文教基金會出版，2000年），卷87，頁4313。

<sup>6</sup> 宋·李心傳：《道命錄》，《續修四庫全書》，冊517，卷7下，頁16。

<sup>7</sup> 宋·滄州樵叟：《慶元黨禁》（板橋：藝文印書館，1966年），頁24。

<sup>8</sup> 宋·程荅照等：《韓溪程氏梅山支譜·始祖系圖》，卷1，頁17。

<sup>9</sup> 宋·周必大：《克庵先生尊德性齋小集·序》，頁2。

<sup>10</sup> 宋·王炎：《克庵先生尊德性齋小集·序》，頁3。

<sup>11</sup> 明·程資：《克庵先生尊德性齋小集·敘》，頁5。

<sup>12</sup> 請參見史甄陶：《家學、經學和朱子學——以元代學者胡一桂、胡炳文和陳櫟為中心》（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年），頁1-25。

仍舊有所不足，特別是對於這部書是在什麼情況下，才被編輯刊刻出來，以及此書在明清時代曾經如何被利用，並且其中所保存的資料，對於目前朱子學研究，又能提供什麼樣的幫助等問題，需要進一步的釐清，目的是希望更深入地挖掘出這批朱熹與程洵書信的研究價值，並且對目前朱子學的研究，進行一些補充。以下便針對這幾方面的問題，進行討論。

## 二、《朱程問答》的編者與成書經過

《朱程問答》在明代之所以能夠面世，最大的功臣應屬程資。程資，又名程仲樸，號櫟峰，又號頤貞子、味善子。生於明憲宗成化二十一年（1485）八月十六日寅時，明武宗正德十一年（1516）應天府鄉試，隔年中舒芬榜進士，授溫州府推官，台州府推官，後赴京陞南京戶部江西司主事，湖廣司員外郎中，任江西南昌知府六年，又陞曲靖兵道，福建按察司副使，雲南布政司參政致仕。<sup>13</sup>

程資頗有經世之才，在擔任溫州推官期間，永康、瑞安二邑水利的關鍵黃州埭毀損，他花費數月工夫整飭，受到當地民眾的感戴，稱此地為「程公埭」；<sup>14</sup>在台州府時期，公餘之際，與學生講論學問，當時有人批評他「以文學飾吏治」，但是他卻主張「正欲因吏治為學耳」；在江西其間，則大興學校，<sup>15</sup>在雲南期間，整飭兵備。可見他在文治與武功上，皆有建樹，除了地方治理之外，程資對於宗族活動相當用心。他曾修訂《婺源柱國程氏支派譜》、又重訂《尊德性齋集》、《朱程問答》、《世德錄》諸書；致仕回鄉之後，程

<sup>13</sup> 清·程蓉照等：《韓溪程氏梅山支譜》，頁 103-104。

<sup>14</sup> 清·吳坤修：《（光緒）重修安徽通志》（北京：北京圖書館，2004 年），卷 184，頁 8。

<sup>15</sup> 葛韻芬：《（民國）重修婺源縣志》（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6 年，民國十四年刻本），卷 24，頁 9。

資重建韓溪世忠祠，立定祠堂規約，<sup>16</sup>對韓溪程氏宗族的整合，大有貢獻。

然而，程資之所以在宗族事業上，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可能與他當時的身分相關。比較有趣的是，程資並非程孟漢的親生兒子，也非同宗過繼，而是養子，但是又極受到族人的重視，可能是因為程氏這一房，只有程資考上進士，所以他能得到族人的認同。然而，程資對程氏家族同樣也盡心盡力，最明顯的便是上述的族譜以及先祖文集的編纂與刊刻，全都是他出錢出力。

在族譜方面，編修的工作最早是由程孟漢兄長的程孟河在明憲宗成化十八年（1482）開始，爾後曾將其中一部分的工作交付程資。明武宗正德十五年（1520）程孟河去世之後，程資看見「族姓日繁，庚甲莫辨，尊卑稱謂之間，庸或有紊」，於是在嘉靖十六年（1537）編完《世德錄》，緊接著便與其兄弟程仲崧、仲杖、仲杉和族孫如峯等人，在此年合力完成刊刻《婺源柱國程氏支派譜》。<sup>17</sup>除此之外，程孟河還將弘揚先祖程洵的工作，也交付程資。程資將程孟河所蒐集的《尊德性齋集》三卷殘卷，<sup>18</sup>加以付梓；至於《朱程問答》則是程資根據家族保存的資料，與族中長輩一同完成。<sup>19</sup>可見程資所完成的工作並非由他個人起頭，而是接下程孟河的遺志。而這些書籍的刊刻費用，全都是程資負責。他的後輩暨學生程伯制說：

嘉靖丁酉，吾師南昌太守櫟峯尊叔先生，重修二房譜成，題曰《婺源柱國程氏支譜》，蓋以此爾。先生發身賢科，忠孝天成，雖歟歷艱關，而顯揚一念，所至不忘，是故在淮有《尊德性小集》之梓，在留都有《朱程問答》之梓，在洪有《世德錄》與茲譜之梓。凡以致夫尊祖敬宗睦族之忱云。<sup>20</sup>

<sup>16</sup> 清·程蓉照等：《韓溪程氏梅山支譜》，頁103。

<sup>17</sup> 清·程蓉照等：《韓溪程氏梅山支譜·卷首》，頁4-5。

<sup>18</sup> 明·程資：《克庵先生尊德性齋小集·敘》，頁135-136。

<sup>19</sup> 明·程資：《朱程問答·敘》，頁1，此書現藏中國國家圖書館。

<sup>20</sup> 明·程伯制：〈柱國支派譜後序〉，清·程蓉照等：《韓溪程氏梅山支譜·舊序》，卷首，頁8。



由此可見，程資雖然遊宦南京和南昌等地，但是持續不斷地刊刻族人文獻，費財費力，為了要顯揚家族名聲，達到尊祖、敬宗和睦族的目的。然而對照他自己的生計，卻是另一種情況，程伯制說：

聞諸先生始理溫、台，僅贍妻孥度支。權淮，日食館穀五升之外，無毫末他染。瓜還之日，一錢不攜，行李蕭然。在洪猶在淮，庭無謁客，志操逾勵。諸凡所梓，絲粟皆俸入之餘。是故先生筮仕二十年，秩二千石，而家無完居，廡無駿輿，耕無菑畬，可以見其守官之概，用才之方矣。<sup>21</sup>

程資自奉儉約，不善交際的性格，在他學生的筆下，表露無遺。然而，其務實有為的態度，仍為時人所稱道。郭希顏（？-1056）曾說：「程君櫟峰，由進士守南昌三年矣，予嘉其行古之政，又惜夫寡諧而無知其賢者，遂因以發之，使人知守之為職不易稱。」<sup>22</sup> 由此可見一斑。

相較於對個人享樂的漠視，程資為家族文獻的保存，可說是不遺餘力。但是這不僅出於他個人的意志，同時也與時代風氣相關。程資的工作主要是延續他從父程孟河的志業，然而程孟河之所以如此關心族譜的修訂，與程敏政在明憲宗成化十八年（1482）出面組織編纂《新安程氏統宗世譜》，有直接的關係。至於程敏政的工作，又與在明代中葉之後，各大家族興起編纂會通譜、統宗譜的風氣有關。<sup>23</sup> 這部譜由程敏政主導，以各族族譜會合而成的《新安程氏統宗世譜》，共四十四房支，上譜族人超過萬人。<sup>24</sup> 程敏政的學問賅博，少年以擅文出名，並且以文學躋身侍從，<sup>25</sup> 但是他在理學方面也用功甚深，曾經編寫《道

<sup>21</sup> 同前註。

<sup>22</sup> 明·郭希顏：〈南昌郡官題名記〉，明·范涑修、章潢纂：《新修南昌府志》（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2年，明萬曆十六年刻本），卷26，頁16。

<sup>23</sup> 王鶴鳴：《中國家譜通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頁168-177。

<sup>24</sup> 常建華：〈程敏政《新安程氏統宗世譜》譜學問題初探〉，《河北學刊》第25卷第6期（2005年11月），頁158。

<sup>25</sup> 同前註。

一編》，主要從學思歷程的角度，說明朱熹和陸九淵兩人「早異晚同」，試圖會合兩人的學說，但他最欣賞的仍舊是朱熹的學說。<sup>26</sup> 同時，程敏政也將朱子學視為程氏家學的核心思想。他曾將《朱子大全集》中，與朱熹往來之族人的書信編為一卷，為要「見家學淵源之所自，使後來者有所觀法，知自力於聖賢之道，而不墮於俗學之陋。」<sup>27</sup> 然而程敏政以朱子學為家學的意圖，也是因應明代官方重視朱子學的緣故。在這樣的號召下，程孟河自然也會關注自己在婺源韓溪這一支派中，與朱熹直接相關的先祖程洵。因此從他這輩開始，積極蒐集程洵的文章。<sup>28</sup> 到了程資這輩，他所編的《婺源柱國程氏支派譜》參見了程洵生前所編修的族譜，<sup>29</sup> 《尊德性齋集》是程洵的文集，而《朱程問答》則是程洵與朱熹來往的信件，同時可見程資的主要工作都環繞在與程洵相關的文獻上。

至於《朱程問答》的編纂，也非一蹴可幾。此書編輯的工作開始於明武宗正德十三年（1518），正是程資考上進士第二年的家居期間；完成於明世宗嘉靖十三年（1534）。<sup>30</sup> 一共歷經十七年。程資為何要編輯這部書呢？他說：

夫儒先祖考之訓，患弗獲見之，則罔弗知寶之，而誦習之忱，表見之念，有弗容但已者矣。於是樽節俸入，謀繡諸梓，僭名曰《朱程問答》，以備家乘之一，與羽翼經訓者攷焉。<sup>31</sup>

<sup>26</sup> 明·程敏政說：「僕性迂僻，獨喜誦朱子之書，至行坐與俱，寢食幾廢。至於《道一編》所葺，皆據朱子成說，觀者不審，以僕為陸氏之學。」明·程敏政：〈答汪僉憲書〉，《篁墩文集》，收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冊1253，卷55，頁3。

<sup>27</sup> 明·程敏政：〈書朱子所與先世二書後〉，《篁墩文集》，卷37，頁8。其中提到程氏族人中，曾與朱熹交往的先祖有程先、程永奇、程大昌、程洵、程端蒙等人。

<sup>28</sup> 明·程資：《尊德性齋·敘》，頁135。

<sup>29</sup> 清·程蓉照等：《韓溪程氏梅山支譜·卷首》，頁3-5。

<sup>30</sup> 目前所看到的《朱程問答》是程績在清仁宗嘉慶15年重校（1808年）的版本，這是根據「韓溪世忠祠藏版」，也就是程資所編定的版本。清·程績：〈重刊朱程問答序〉，清·程蓉照等：《韓溪程氏梅山支譜》，卷1，頁53。

<sup>31</sup> 明·程資：《朱程問答·敘》，頁1。

可見他的動機是一方面為了保存家族先祖的文獻，並且希望族人重視，另一方面則是為著羽翼經傳而作。但這並非全靠他一人之力完成，主要是依據族中的先世遺墨，其中已有「洵祖往問書八，晦庵答教書二十有二」，<sup>32</sup> 這項工作才得以進行。然而這批先世遺墨是怎麼被保存下來的呢？根據程資在《朱程問答》的書末所刊刻的跋語中，可以得知元代的學者所看見的是程洵六世孫程成德（1307-1365）的家藏本。程成德，字敏中，號前村翁。因著他在元朝末年，保障居民身家安全，授官婺源州判。<sup>33</sup> 根據程資從弟程玘的推測：

唯是兵燹屢遭，文墨煨燼，其最慘者相傳至正戊戌紅巾寇盤踞盤谷、曉湖之間，往來出沒，藉為窠巢。……是故伯圭府君去之詹山，知非府君去之武夷，倉猝奔竄，所謂僅以身免。餘物非付之烈焰，則委諸塵土。蓋狼腹既饜，天兵亦至，乃大肆焚戮，猖獗而東矣。聞知非府君始構義學，多所儲架，蓋墨莊也。繼隱隆坑，圖書數卷，猶足自餘，而咸罹一炬之厄，惜哉。……豈前村府君以保境拜官，獲存此歟？<sup>34</sup>

由此可見，元朝末年婺源地區曾經遭逢兩次大劫，一次是紅巾之亂，另一次是朱元璋的軍隊過境。這兩次的兵戎之禍，讓程氏家族分崩離析，程成德的長兄程天祐（字伯圭，號瞻山）逃往詹山，其弟程致和（一名安都，字本中，號知非子）逃往武夷。只有程成德留在婺源任官，因此才能保存家族文獻。到了明代，程玘為了請祀程洵的父親程鼎入鄉賢祠，於是「序次先世文墨，自成一編，序而藏之」。<sup>35</sup> 爾後程資才能利用這批先世遺墨，再增補《朱子大全集》十篇和《新安文獻志》一篇的內容，一共四十一篇，編定為《朱程問答》一書。

至於此書的體例，程資做了一番整理。他的編排是：

<sup>32</sup> 同前註。

<sup>33</sup> 清·程蓉照等：《韓溪程氏梅山支譜》，卷1，頁26。

<sup>34</sup> 明·程玘：〈重編世墨序〉，清·程蓉照等：《韓溪程氏梅山支譜·序》，卷1，頁48-49。

<sup>35</sup> 同前註，頁49。

為洵祖者曰「問」，為晦庵者曰「答」，就條批答者曰「別楮」。取書中別楮條析以往之義，亦以「問答」字，直系各條之上。不敢數數及二先生氏號，懼瀆也。「別楮」有連上為一時之言者，有否者。若曰「內帖」、曰「紙尾」，則皆連上為一時之言。資復竊稽《晦庵年譜》，參以時事，稍可證者，妄為次序先後，并擬議其年月，標示其所從得曰「見某書」，或云「見先世遺墨」。有差異者，備載其說，與所以從違之愚，俟訂正焉，從今註例各敬疏諸其下。其第三卷與二卷末篇，則年月無證，先後叵序矣。最後一篇，亦非知其當後而候之也，特以道園諸公題跋在焉爾。<sup>36</sup>

程資依照信件內容的差異，分門別類加以標記。這樣的整理，可以了解這些書信間的關係，補充目前《朱子文集》中，<sup>37</sup> 僅以寄信對象為標題的缺點，或僅存以論學為主要內容的書信。藉由程資的考訂，可以看見朱熹與程洵書信往來，特別是論學的「別楮」，<sup>38</sup> 或者問候家中親人的「內帖」，是在哪些書信

<sup>36</sup> 明·程資：《朱程問答·敘》，頁1

<sup>37</sup> 本文中所對照的《朱子文集》，是由陳俊民所校訂的版本。此書以明嘉靖十一年胡岳等重刻閩建本為底本。此底本根據明成化年間黃仲昭的校勘，為明清以來，各類叢書影印重刊、官私藏書家所藏最廣的版本。陳俊民：《朱子文集·校編敘例》，頁1-8。

<sup>38</sup> 程資所說的「別楮」，朱熹自己在信中以「別紙」稱之。根據陳靜的研究，宋代將「別紙」視為「書信附件」，在社會上被廣泛使用。陳靜：〈「別紙」考釋〉，《敦煌學輯刊》1999年01期（總第35期），頁108-112。吳麗娛則是指出，別紙在唐代後期五代社會，別紙「作為固定格式的公文之後的另外敘事和說私話，當然更用在對長官的賀官、賀節、起居儀中以表達恭敬和鄭重之意。」吳麗娛：〈再論復書與別紙〉，《燕京學報》新13期（2002年11月），頁107-123，並沒有討論到宋代的情況。徐力恆的研究則是指出，別紙在宋代官僚體系中，內容涉及官員們對於軍政的討論。Lik Hang Tsui, "Writing Letters in Song China (960-1279): A Study of its Political, Social, and Cultural Uses," D.Phil. diss., University of Oxford, 2015, pp. 56-62, 123-145. 此研究顯示到了南宋時代，「別紙」運用的層面更加廣泛。這個現象也可以從朱熹寫給程洵的「別楮」中看見，朱熹在別紙中，全部都是討論經書的內容，主要作為論學之用。

中一起傳遞。此外，在《朱程問答》中，程資將可以考訂年分的信件，編排在〈卷一〉與〈卷二〉中，無法確認時間的置於〈卷三〉，而先世遺墨是他編排信件順序的重要根據。相較於經過後代學者之後所整理的《朱子大全集》和《新安文獻志》，程氏家族所保存下來的先世遺墨，更貼近朱熹和程洵信件的原始面貌。

### 三、《朱程問答》編纂前後的影響

關於《朱程問答》在歷史上的影響，應該分為兩部分來看：一部分是此書尚未編纂完成之前，也就是程資所提到「先世遺墨」階段，這些朱熹和程洵的通信內容，已經受到多位學者稱讚及利用；另一部分則是此書在程資手中刊刻之後，對後世學者的影響。

由《朱程問答》最後所列的跋語，以及作跋的學者來看，<sup>39</sup>程資手中的這批先世遺墨，在元代就已經公諸於世，但並沒有被善加利用。到了明代，為了要升祀程洵的父親程鼎進入鄉賢祠，所以這批資料才被重新整理。<sup>40</sup>再者就是作為程洵立傳的根據。程洵的傳記，雖然在元代汪幼鳳已寫過，<sup>41</sup>但是資料的來源，多半是從《朱子大全集》的朱熹信件，以及王炎、周必大為程洵文集所作的〈序〉，這些都是間接的材料。並且汪幼鳳文章的內容，幾乎以一半的篇幅介紹程洵的父親程鼎和其後人程樗，關於程洵的部分相當精簡。於是，當明代程瞳在編纂《新安學繫錄》時，並沒有採用汪幼鳳所寫的內容，而是利用家

<sup>39</sup> 作跋的學者有虞集（1272-1348）、余謙、汪澤民（1273-1355）、李祁、滕堞、董朝宗和董仲可。這七位學者除了虞集和余謙之外，其餘五位都提到他們所讀到的是程成德的家藏本。明·程資：《朱程問答》，卷3，頁31-33。

<sup>40</sup> 明·程玘：〈重編世墨序〉，清·程蓉照等：《韓溪程氏梅山支譜·序》，卷1，頁49。

<sup>41</sup> 元·汪幼鳳：〈程知錄洵傳〉，明·程敏政編：《新安文獻志》（合肥：黃山書社，2004年），卷69，頁1691。

族的先世遺墨，重寫程洵的傳記。<sup>42</sup> 由於《新安學繫錄》的編纂，正值王學興盛的階段，為了要標榜徽州地區從南宋到明代的學術傳承，皆以程朱之學為主。為了達到編纂此書的目的，他在文章中主要談到程洵對《易》、《論語》的解說、對《正蒙》和《上蔡語錄》的批評，以及對「誠」的重視，並且在引用程洵文字下，以小字附註朱熹贊同之語。至於《朱程問答》中，朱熹與程洵意見不同之處，皆未收錄。<sup>43</sup> 由此可見，這批程洵與朱熹往來的文獻，在明代程瞳手中，成為建立新安地區的朱子學系譜的工具。但是這樣的手法，並未忠實地反映出程洵思想的面貌。<sup>44</sup>

到了清代，《朱程問答》受到夏炘（1789-1871）的重視。夏炘在《述朱質疑》中，曾經利用《朱程問答》作為探討朱熹學思經歷的佐證。但需要說明的是，他將此書的名稱改為《朱程答問》。「問」、「答」二字，在此書中分別代表程洵和朱熹的書信。程資站在尊崇先祖的立場上，將書名訂為《朱程問答》，但是夏炘卻改為《朱程答問》，或許想表達的是推崇朱熹的立場。<sup>45</sup>

夏炘之所以重視《朱程問答》，主是為了想振興「新安理學」的緣故。<sup>46</sup> 這與明代程瞳的用心，如出一轍。他在〈跋朱程答問〉中說：「今朱子之祀享遍海內，而精神陟降，尤當戀戀於紫陽星渚之間。學者幸生文公闕里，則桑梓先賢，尤宜效法。宜何如講明切究，厲德脩行，以無愧東南鄒魯之稱乎。」<sup>47</sup> 顯然欲藉此書，勸勉清代徽州學者繼續發揚朱子學說。

夏炘藉由《朱程問答》的資料，考訂朱熹在學問上的主要發展歷程，涉及

<sup>42</sup> 明·程瞳：〈程克庵傳〉，《新安學繫錄》，卷7，頁134-137。

<sup>43</sup> 程洵與朱熹觀點相左之處，請見下一節中關於〈西銘〉的討論。

<sup>44</sup> 關於程洵與朱熹在理學思想上的差異，在第四節分析「〈西銘〉別緒」問題時討論。

<sup>45</sup> 感謝中央大學楊祖漢教授提供寶貴的意見。

<sup>46</sup> 清·夏炘：〈新安理學自朱子再至婺源始有傳人說〉，《述朱質疑》，《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冊952，卷16，頁14。

<sup>47</sup> 清·夏炘：〈跋朱程答問〉，《述朱質疑》，卷16，頁6。

以下五個主題：（一）「〈程欽國〉的寫作年代」；<sup>48</sup>（二）「朱子丁亥戊子從張南軒先察識後涵養考」；<sup>49</sup>（三）「朱子己丑以後辨張南軒先察識後涵養考」；<sup>50</sup>（四）「朱子己丑以後專發明程子敬字考」；<sup>51</sup>（五）「朱子廬墓寒泉考」。<sup>52</sup>其中第一點到第四點涉及夏斨最關鍵的「朱學三變」之說，<sup>53</sup>是他糾正王懋竑觀點的論據。由此可見《朱程問答》一書對夏斨的重要性。就著第三點而言，夏斨藉由《朱程問答》的版本中，多了「體察」二字，作為他論據的關鍵。<sup>54</sup>至於第四點，夏斨藉由《朱程問答》的資料，說明朱熹在乾道五年（己丑）之後，發明程頤涵養用敬之說，而陳來先生也從夏斨引用《朱程問答》的材料，說明朱熹其實在乾道五年己丑之悟，就已經強調持敬的重要性，不必待己丑「之後」，極為精闢。其實在《朱程問答》中所收之乾道五年的佚文中，朱熹很明確地告訴程洵：「河南夫子發明『敬』字，乃聖學始終之要，學者日用之間，便須行持此字，更於念慮之間，分別義利兩途，只此便是天理人欲之判，舜、跖分手底路頭，不可不審也。」<sup>55</sup>不知夏斨為何遺漏？至於第一點〈程

<sup>48</sup> 清·夏斨：〈附考答許順之程欽國何叔京陳正己書〉，《述朱質疑》，卷1，頁12。

<sup>49</sup> 清·夏斨：〈朱子丁亥戊子從張南軒先察識後涵養考〉，《述朱質疑》，卷3，頁11。

<sup>50</sup> 清·夏斨：〈朱子己丑以後辨張南軒先察識後涵養考〉，《述朱質疑》，卷4，頁6。

<sup>51</sup> 清·夏斨：〈朱子己丑以後專發明程子敬字考〉，《述朱質疑》，卷5，頁4。

<sup>52</sup> 清·夏斨：〈朱子廬墓寒泉考〉，《述朱質疑》，卷16，頁2。

<sup>53</sup>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0年），上冊，頁298。清·夏斨說：「朱子之學凡三轉：十五六歲後，頗出入二氏，及見延平而釋然，此朱子學之第一轉也。受中和未發之旨於延平，未達而延平沒，乙酉、丙戌之間，自悟中和舊說，又從張敬夫先察識後涵養之論，此朱子學之第二轉也。己丑更定中和舊說，并辨敬夫先察識之非，一以『涵養用敬』、『進學致知』二語為學者指南，此朱子學之第三轉也。」清·夏斨：〈與胡瑒卿茂才論學部通辨及三魚堂集答秦定叟書書〉，《述朱質疑》，卷5，頁17-18。

<sup>54</sup> 程資在信尾的考證中說：「『行住坐臥處，體察方自有見』，《大全》作『行住坐臥處，方自有見』」。明·程資：《朱程問答》，卷1，頁34。

<sup>55</sup> 明·程資：《朱程問答》，卷2，頁1。

欽國〉的繫年問題，王懋竑主張寫於紹興三十年（1160），但是夏忻藉由《朱程問答》所記「熹頓首，一別數年，懷想無已」，主張此信寫於紹興二十三年（1153）。此說已被陳來先生反駁，主張此信仍為紹興三十年所寫，<sup>56</sup> 東景南先生亦然。<sup>57</sup> 但是從《朱程問答》的編排和內容來看，此信仍有可以商議之處。

在《朱程問答》編排中，此信的下一封起首即寫「熹頓首，去歲承書時已西上，昨歸讀之，良以自慰。然無便不能報，日有向往，比惟侍奉吉慶，比諸曲折已略具所奉表叔書中矣，不縷縷。」<sup>58</sup> 這段文字現不存於《朱子文集》中，此段以下便接著〈答程允夫二〉「所示詩文，筆力甚快。」<sup>59</sup> 按照陳來先生的編年，「所示詩文」一書也在紹興三十年。但若是上述二信都在同一年完成，朱熹也不必說「去歲承書時已西上」，顯然〈程欽國〉要比〈答程允夫二〉（「所示詩文」）完成的時間更早一些。

但是〈程欽國〉這封信便如夏忻所說，寫於於紹興 23 年嗎？其實並不盡然。在此信中有兩個重要的關鍵，值得查考，一是朱熹提到「講學近見延平李先生，始略窺門戶，而疾病乘之，未知終得從事於斯否耳。大概此事，以涵養本原為先，講論經旨，特以輔此而已。」另一個關鍵點是「近集諸公《孟子》說為一書，已就稿。」根據學者們的研究，朱熹曾面見李延平的時間為紹興 23 年、28 年與 30 年，<sup>60</sup> 然而朱熹作《孟子集解》始於紹興 27 年，<sup>61</sup> 若是此時已經就稿，那麼，此信完成的時間應該在紹興 27 年之後。此外，朱熹在信中提到「涵養本原」的問題，這在紹興 27 年李侗給朱熹信中，就已經提及「於涵養處著力，正是學者之要。」<sup>62</sup> 從以上的線索來看，〈程欽國〉一信或可繫

<sup>56</sup> 陳來：《朱子書信編年考證》（北京：三聯書店，2007 年），頁 21。東景南：《朱熹年譜長編》（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 年），卷上，頁 355。

<sup>57</sup> 東景南：《朱熹年譜長編》，卷上，頁 264。

<sup>58</sup> 明·程資：《朱程問答》，卷 1，頁 5。

<sup>59</sup> 宋·朱熹：〈答程允夫二〉，《朱子文集》，卷 41，頁 1766。

<sup>60</sup> 陳來：《朱子書信編年考證》，頁 21。

<sup>61</sup> 東景南：《朱熹年譜長編》，卷上，頁 219-220。

<sup>62</sup> 同前註，頁 225。



於紹興 28 年或 29 年。

《朱程問答》當中，朱熹和程洵往來的通信，對於重建程洵的傳記，的確有正面的作用。明代程瞳藉此重新呈現程洵與朱熹往來的證據，以及在思想上傳承的關係；清代夏炘藉由《朱程問答》的內容，重新確認朱熹學思歷程，並與王懋竑《朱子年譜》商榷，雖然其論點仍有討論的餘地，但是可以看出《朱程問答》所保存的資料，的確能提供更細緻地梳理朱熹生平的可能性。以下便針對《朱程問答》對於現今朱子學研究成果所能提供的補充，進行討論。

#### 四、《朱程問答》的考訂作用

《朱程問答》對於目前朱子學研究所能提供的幫助，可以從內容與文獻兩方面來看。就著內容而言，市來津由彥曾說明，朱熹的書信是理解其學思歷程的重要文獻，同時也可藉此得知朱熹與其門人和朋友之間，在學術討論上的互動關係。<sup>63</sup>《朱程問答》的確也具有此方面的功能。此外，在這些書信中，也保存兩人生活中的諸多紀錄，例如家庭、交遊對象和生活態度等等，可說是理解朱熹生平提供了重要的線索。<sup>64</sup>此外，就著文獻的價值而言，《朱程問答》不僅保存了目前《朱子文集》當中所沒有的朱熹佚文，同時也收錄程洵寫給朱

<sup>63</sup> (日) Ichiki Tsuyuhiko, "The Value of Zhu Xi's Letters as Historical Material: A Viewpoint from Research into the History of Thought." in *the Study of Song Histo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edited by the Research Group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in Song China. (Tokyo: Ando Satsu Kogyosha, 2000), pp.129-153.

<sup>64</sup> 從書信研究了解古人日常生活和交遊，並且還原古人有血有肉的形象，主要是受到 2011 年東英壽所發現歐陽修 96 封書簡的研究，以及後續之學者探討的啟發。茲參見東英壽：〈新見歐陽修書簡考〉，《東華漢學》第 15 期（2012 年 6 月），頁 275-288。李強：〈溝通與認同：歐陽修書簡中的文人世界〉，《史林》2013 年 01 期，頁 59-68。洪本健：〈歐陽修《書簡》略論〉，《福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 年 05 期，頁 36-45。歐明俊：〈從新發現的 96 通書簡看歐陽修的日常生活〉，《武漢大學學報》2012 年 03 期，頁 35-38。

熹的書信，如此便可以更直接地對照出他們討論的問題脈絡以及思想差異。此外，若與《朱子文集》的書信對照，可以發現《朱子文集》的書信內容，已經有所刪改並且順序錯置，而《朱程問答》的書信內容較為完整，得以作為書信年代的考證資料。這對於目前的朱熹研究，具有補充的作用。以下便分為四個部分說明。

### （一）考訂朱熹書信的繫年

程資很重視信件的繫年，這對於目前朱熹文獻的研究，提供了兩方面的補充。首先，程資根據先世遺墨和《家譜》，對朱熹在乾道年間的書信，編排得特別用心，考證也較詳盡。他在書信下方的按語中說：

按《家譜》，洵祖之父號韓溪翁，乾道元年十月二日卒。此篇起至〈別楮〉「心性」一段，「語皆有病」條止，為洵祖往問書三、晦庵答教書四、內帖二、別楮二，多告慰問之詞，蓋皆是年以後，乾道四年七月以前書也。此篇起至乾道四年六月望日，洵祖往問書止，俱見先世遺墨。<sup>65</sup>

程資對照書信內容與《家譜》中的記載，確認朱熹與程洵往來書信的時間點及排列順序。這對於了解朱熹與程洵在乾道初年至四年之間，思考了哪些問題，很有幫助。

其次，在《朱子文集》中，若是依照收信者題名的論學書信，不太容易得知論學書信與其他書信之間的關係。這點在《朱程問答》中，可以得到一些補充。例如若是依照程洵寫給朱熹之信的內容，可以看出在《朱子文集》中，標著為〈程允夫四〉（表叔墓刻不敢忘）和〈程允夫五〉（答「觀志觀行」），<sup>66</sup> 以及〈答程允夫五〉（熹頓首允夫賢表解元，久不聞問，方以為

<sup>65</sup> 明·程資：《朱程問答》，卷1，頁14。

<sup>66</sup> 宋·朱熹〈程允夫四〉：「表叔墓刻不敢忘。」陳俊民校編：《朱子文集》別集，卷3，頁5148；〈程允夫五〉：「答觀志觀行。」陳俊民校編：《朱子文集》別集，卷3，頁5148-5149。

懷)，<sup>67</sup>都回應了程洵去信所詢問的內容，應該是在同一通信中。如此一來，前述的兩通信的編年，應該放在「乾道四年七月」以前；<sup>68</sup>此外，依據《朱程問答》的編排，目前可見的〈程允夫二〉（某家中自先人以來）<sup>69</sup>與〈程允夫洵一〉（先集無人寫得）<sup>70</sup>應該是同一通信，而現今在《文集》中被拆成兩篇，而此信就著《朱程問答》的考證，應與〈程允夫二〉（熹泣血）<sup>71</sup>放在一封信中傳遞，同樣是因為與程洵去信的內容相關，並且此信應繫年在「宋孝宗乾道五年」（1169）。<sup>72</sup>

## （二）考訂林用中來訪時間

林用中，字擇之，一字敬仲，別號東屏，又稱草堂先生。福建古田人。<sup>73</sup>朱熹很看重他，曾說：「此人曉事，非其他學者之比。」<sup>74</sup>他不僅在朱熹家塾中擔任其子朱塾和朱塾的老師，並且還曾經陪同朱熹一起到潭州，拜訪張栻二個月。但是關於他是什麼時候投身於朱熹門下，王懋竑主張是乾道三年

<sup>67</sup> 宋·朱熹〈答程允夫五〉：「熹頓首允夫賢表解元，久不聞問，方以為懷。」陳俊民校編：《朱子文集》，卷41，頁1777-1778。

<sup>68</sup> 陳來先生將這兩封信繫年於「宋孝宗淳熙八年辛丑1181年」。陳來：《朱熹書信編年考證》，頁206。

<sup>69</sup> 宋·朱熹〈程允夫二〉：「某家中自先人以來，……計不出今冬也。」《朱子文集》別集，卷3，頁5145。

<sup>70</sup> 宋·朱熹〈程允夫洵一〉：「先集無人寫得。」《朱子文集》別集，卷3，頁5144-5145。

<sup>71</sup> 宋·朱熹〈程允夫二〉：「熹泣血，言熹罪逆重不自死滅。」《朱子文集》別集，卷3，頁5145。

<sup>72</sup> 陳來先生將〈答程允夫一〉（「先集無人寫得」）繫年於「宋孝宗淳熙八年辛丑1181年」。陳來：《朱熹書信編年考證》，頁205。

<sup>73</sup> 陳榮捷：《朱子門人》（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2年），頁145。

<sup>74</sup>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冊7，卷120，頁2882。

(1167)，<sup>75</sup> 東景南認為是乾道二年三月，也就是中和舊說建立之前。<sup>76</sup> 這個問題看似各有所據，然而就著《朱程問答》所收錄的書信來看，其中仍有混淆需要釐清。

王懋竑認為「林擇之以丁亥（乾道三年）從學，而水災為第一書。」<sup>77</sup> 此論可議之處在於，朱熹在〈林用中字序〉中提到「古田林子用中，過予于屏山之下，以道學為問，甚勤。……乾道二年三月癸亥。」<sup>78</sup> 顯然林用中的確是在乾道二年便前往福建，向朱熹問學。但是，東景南先生認為林用中在乾道二年，便至朱熹家擔任塾師，<sup>79</sup> 這也需要再議。因為根據朱熹寫給程洵的信中，可以得知林用中應該是乾道二年曾經去福建拜訪朱熹，而乾道三年才到朱熹家中任職塾師。此事的證據是：

閩中前輩喪亡略盡，今惟湖南尚有此血脈。張魏公之子栻，字欽夫者，所見極明了正當，旦夕將往見之，相與講所疑也。張所為文，且錄一、二篇去，其所發明深切，試詳味之，當有得耳。此間有一、二朋友亦佳，有林擇之者，古田人，所見極親切，今年招之教二子，旦夕俱為湘中之行也。<sup>80</sup>

朱熹告訴程洵，他即將前往潭州，去見張栻，此年是乾道三年。其中很明確地談到林用中在「今年招之」，又說「旦夕俱為湘中之行」，並且他在一段話中用了二次「旦夕」，可見此信寫作距離朱熹出發之日不遠。<sup>81</sup> 另外還有一條旁證，可以說明此信不會是寫在乾道二年。因為編排在此信之前的一封信中，朱

<sup>75</sup> 清·王懋竑撰，何忠禮點校：《朱子年譜考異》（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卷1，頁305。

<sup>76</sup> 東景南：《朱熹年譜長編》，卷上，頁347。

<sup>77</sup> 清·王懋竑撰，何忠禮點校：《朱子年譜考異》，頁305。

<sup>78</sup> 宋·朱熹：〈林用中字序〉，陳俊民校編：《朱子文集》，卷75，頁3771-3772。

<sup>79</sup> 東景南：「三月，林用中來學，為作字序，處以家館（家塾），以教朱塾、朱堃二子。」東景南：《朱熹年譜長編》，卷上，頁347。

<sup>80</sup> 此信為朱熹佚文，見明·程資：《朱程問答》，卷1，頁22。

<sup>81</sup> 東景南：《朱熹年譜長編》，卷上，頁370。

熹說：「表叔逝去條已周祥」，並在信尾署上「臘月十三日」。朱熹所說的表叔，就是程洵的父親程鼎。程鼎在乾道元年十月過世，而周祥也就是小祥，<sup>82</sup> 所以朱熹寫此信的時間，應該是乾道二年十二月，而下一封信寫於乾道三年，也是情有可原。至於東景南先生以〈與祝直清書〉說明朱熹與林用中的交往時間。在此信中，朱熹對祝直清說：

近視太叔翁發至《論孟訓釋》，看得程氏之理透徹，涵泳其間，多有好處，頗合鄙意。內疑惑未敢據所見，俟榮旋討論，且留之。恨此中前輩寥寥，幸得古田林擇之，邀至家館教塾、塾二人，其見明切。近得湖南張魏公子欽夫者一二文字，觀所見正當，儘有發明，欲往見，相與講釋所疑。<sup>83</sup>

東先生根據「榮旋」二字，判斷此信寫於乾道二年，<sup>84</sup> 洵是確論。但這也並不能直接說明林用中是在乾道二年赴朱熹家館之任，若說林用中已經同意朱熹的邀請，但尚未動身，也不無可能。祝直清與程洵都是朱熹的表弟，此信的內容與寫給程洵的內容大致相同，但是語氣較為舒緩，同時也並沒有提到要帶林用中前往潭州，可見朱熹決定要與他一起拜訪張栻，應該是林用中在乾道三年擔任塾師之後的事情。

### （三）考訂葉仁的事蹟

朱熹的書信中，有兩封信是給葉仁父。<sup>85</sup> 然而關於葉仁父是誰，目前在二手研究中，仍然不得而知。<sup>86</sup> 若是將「父」字視為對男子的稱呼，目前可見之

<sup>82</sup> 丁福保《佛學大辭典》：「（雜語）一周忌也。佛之一周忌即儒家之小祥忌，故謂之祥。」「臺大獅吼佛學專站」，網址：<http://buddhaspace.org/dict/dfb/data/%25E5%2591%25A8%25E7%25A5%25A5.html>。查詢日期：2014年11月8日。

<sup>83</sup> 明·程敏政：《新安文獻志》，卷9，頁268-269。

<sup>84</sup> 東景南：《朱熹年譜長編》，卷上，頁348。

<sup>85</sup> 這兩封信收於陳俊民校編：《朱子文集》，卷63，頁3150-3152。

<sup>86</sup> 陳榮捷所著《朱子門人》中，沒有此人的記錄。（韓）尹胄夏《考亭舉隅》的目錄中有此人姓名，但沒有生平簡介。此書收於韓國慶尚大學圖書館文泉閣「南冥學古文獻」。

《朱子文集》所保存之朱熹寫給程洵的信件裏，「葉仁」只被提到一次。<sup>87</sup>難以得知此人與朱熹的關係。但是在《朱程問答》中，葉仁這個人物卻頻繁地出現在朱熹和程洵的信中，這些紀錄便提供了關於他生平的蛛絲馬跡。茲將書中提及葉仁的部分，整理如下：

時間（按《朱程問答》順序排列）	發信者	信件內容	
1	乾道元年	朱熹	熹頓首，十二月三日之夕，葉仁至，忽聞十四表叔奄忽傾背，舉家驚慟失聲，不能已已。
2	乾道二年	朱熹	《大全》尤錯亂重複，愈於無書爾。既自有之，葉仁往來卻附回尤佳，
3	乾道三年	朱熹	熹頓首。葉仁至，辱兩書之貺，陳義甚高，三復感嘆，且書比日侍奉之餘，體力支勝為慰。……以上幸不罪其僭，葉仁還，草此奉報。
4	乾道三年	程洵	洵拜覆五二表兄座前，向葉仁歸，拜所賜教兩幅，感慰。……葉仁告行甚速，匆匆拜此
5	乾道四年	程洵	洵拜覆，去冬葉仁來索書，匆匆作數字欲附上，已而徑去，不至問之，則云已行矣，頗以為恨，自失此便又復半載，不勝瞻仰之情。……去歲葉仁歸，聞之湘中未還，度到家時必已歲晚，既見欽夫，所論必甚眾，有可以言傳筆授者否？

<sup>87</sup> 宋·朱熹：〈答程允夫五〉，陳俊民校編：《朱子文集》，卷41，頁1777。

6	乾道四年	朱熹	已叮嚀葉仁來時去取書，恐更有商量處，一一示及。
7		程洵	去年十一月在婺源遇葉仁，知其有行也，即草作幅書屬朱德和以授之。今夏於德和處，奉五月二十九日所示問，乃不及此，豈此書竟沉耶？
8	乾道五年	朱熹	葉仁歸鄉，附此哀訴荒迷不次，十一月日熹泣血啟訴允夫賢弟解元。
9	乾道七年	程洵	表伯母之喪，行及三祥，洵以頻年客食他邑，葉仁往還時，多不相值，尚未得致微奠，謹納去官會三千，並奠狀一封，乞為昭告靈，几以申區區之誠，息緩之罪，猶庶幾恕之。
10		程洵	至秋冬間，屢欲拜書，皆以地遠，不知葉仁行期，比遣書往，則後時矣，惶恐惶恐。
11	乾道九年或淳熙元年	朱熹	熹久不聞動靜，嚮往之深。葉仁來，承書具審，比日侍奉安佳，良以為慰。……葉仁歸，草草附此，惟以時進德自愛，不宣。
12	慶元元年或二年	朱熹	葉仁來，得六三兄書，云吾弟數來問，便次欲附書，來知必將有以見復，及問諸葉仁，則云未嘗往取書也。
13	慶元元年或二年	朱熹	葉尉便中復附此草草，餘唯自愛為祝，不宣。

葉仁生卒年不詳，朱熹、程洵分別以「歸」、「還」字說到他的行程，可見他是徽州婺源人。朱熹和程洵在信中對他大多都是直呼其名，僅有朱熹晚年

給程洵最後一封信中，以「葉尉」稱呼他，這說明他曾擔任縣級的官吏，但在此之前，葉仁很有可能是專門負責傳遞私人郵件的信差，經常往來於徽州和福建之間，可說是朱熹和程洵互通消息的關鍵人物。<sup>88</sup> 他幫兩人送信始於乾道元年（1165），直到慶元二年（1196）程洵過世之前，前後歷經三十二年。就著朱熹寫給葉仁父的信件中提到「方有詭偽之禁」，所以此信可能寫於慶元三年偽學之禁時。<sup>89</sup> 由此可見，程洵過世之後，葉仁送信的工作也就停止了，與朱熹便有信件的往來。

若是從《朱程問答》所提供的線索，進而解讀朱熹寫給葉仁之信的內容，便更可看出朱熹為人處世的價值觀。這封寫於「詭偽之禁」的信，很有可能是葉仁想謀求差事，請朱熹推薦，然而朱熹表達婉拒之意。他在此信中提到：

所以凡為人者，只合講明此理而謹守之，不可昏棄，若乃身外之事，榮悴休戚，即當一切聽天所為而無容心焉。……區區早從師友，即幸見得此理，故嘗以此自勉，亦不敢不以此待人，所以生平未嘗求知於人，亦不欲為朋友求知，唯其一二或以貧老困厄，不得其所，則嘗言之，然亦絕無而僅有也。如吾友者，於學尚可以勉，而亦未為甚貧且老而困厄之久者，故前此累承喻及，皆非區區所欲聞，而以方有詭偽之禁，故不欲盡其言，亦意賢者當默曉也。<sup>90</sup>

<sup>88</sup> 就著《朱程問答》中的記載，朱熹與程洵信件的往來方式，大多是依靠葉仁送信，另外朱熹兩次建議以「遞」來傳送往來的信件。一是乾道五年朱熹去信給程洵中言及：「遞中附書往來甚佳。」程資：《朱程問答》，卷1，頁5。另一次則是朱熹晚年告訴程洵：「如有書只從遞中，發來崇安丞廳可也。」同上書，卷3，頁30。由此可見，朱熹與程洵之間的信件，除了專人送信之外，朱熹也利用官方郵遞系統進行。參見李強：〈溝通與認同：歐陽修書簡中的文人世界〉，頁59-62。趙效宣：《宋代驛站制度》（臺北：聯經事業出版公司，1983年），頁25-28。

<sup>89</sup> 清·王懋竑：《朱子論學切要語》，收於《朱熹年譜考異》，卷2，頁468-469。陳來：《朱子書信編年考證》，頁449。

<sup>90</sup> 宋·朱熹：〈答葉仁父一〉，陳俊民校編：《朱子文集》，卷63，頁3150。



從行文中可以得知，朱熹「謀道不謀食」的態度。他認為「為人」最重要的是體認天理並且謹守，至於人在世間究竟是錦衣玉食，或者家徒四壁，應當順隨天命，不必留心在意。這是他早年就已建立的處世觀，直到晚年仍舊如此。所以朱熹說，他不曾推銷自己以求被人了解，也不曾推薦朋友以為其謀得出路，即便出手幫忙，也是朋友在極其艱難的情況之下，可是少之又少。在朱熹看來，葉仁尚未到走投無路的地步，並且朱熹自己也身陷黨禁之中，所以不願意推薦。這封信一方面向葉仁傳達他婉拒的立場，但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朱熹面對外在境遇的態度，特別是當他遭到政治桎梏之際，依然堅守著憂道不憂貧的態度，正反映出他晚年的人生觀和價值觀。

#### （四）考訂朱熹早年對張載學說的觀點

《朱程問答》對於了解朱熹和程洵的學術觀點，也會有所幫助。其中涉及的議題有：對蘇學的抨擊、<sup>91</sup> 對二程之學的提倡（包含對《二程文集》刊刻和傳播）、對《論孟精要》的研讀、對張栻論「敬」的推崇，以及對張載學說的想法等等。除了最後一點之外，前面四點筆者已有討論，<sup>92</sup> 現不再贅述。本文就著朱熹與程洵如何思考張載《正蒙》與〈西銘〉的問題，進行探討。

雖有學者表示朱熹十五歲以後受到胡憲的影響，沉迷苦讀張載《正蒙》。<sup>93</sup> 但是若更複雜地了解朱熹對張載的態度，從現存的《朱子文集》與《朱程問答》所收錄的信件中，可以看出朱熹即便早年讀過《正蒙》，但是態度並不積極。他在紹興三十年（1160）對程洵說：

<sup>91</sup> 朱熹與程洵討論蘇學的書信，都收於《朱子文集》中，目前的研究成果有：栗品孝：《朱熹與宋代蜀學》（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頁33-35、59；涂美雲：《朱熹論三蘇之學》（臺北：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頁215-246；史甄陶：《家學、經學和朱子學》，頁12-14；王奕然：〈析論朱子和弟子程洵思想的異同——以兩人對蘇學的看法為討論核心〉，《東華人文學報》第21期（2012年7月），頁29-44。

<sup>92</sup> 史甄陶：《家學、經學和朱子學》，頁7-23。

<sup>93</sup> 東景南：《朱子大傳》，頁72。

《正蒙》建陽舊有本，近來久不曾見，俟病少間，當為尋問也。然此書精深難窺測，要其本源，要不出《六經》、《語》、《孟》。且熟讀《語》、《孟》，以程門諸公之說求之，涵泳其間，當自有得。然後此等文字，可循序而及，方見好處。<sup>94</sup>

爾後，朱熹在乾道三年（1167）又告訴程洵：

《正蒙》附去，恐不必深究，但熟讀《論》、《孟》，參以程氏之說，求之義理自明矣。踐形之說，大概得之，但云聖人盡踐履之道，恐未當。蓋形色雖皆天性，而惟聖人能盡其性。故能充是形，而無愧於天之與我者云耳。<sup>95</sup>

這兩封信相差的時間有七年之久，但就著內容來看，朱熹對《正蒙》的看法並沒有太大的改變，主要還是強調此書精深，若要了解其義理，透過熟讀《論語》、《孟子》及程氏之學即可，無需特別深究。然而，程洵並不全然贊成朱熹的看法。他對朱熹說：

《正蒙》歸納，此書幽深，恐非初學之所能讀。讀之而不識其趣，恐未免有弊，非此書之弊，不善學則弊也。<sup>96</sup>

程洵倒是對《正蒙》抱持著較正面的意見。他認為此書的問題不在於內容，而是與讀者學習方法有關。但是這樣的說法，並沒有改變朱熹早年對《正蒙》的觀點。

朱熹當時之所以不重視《正蒙》，應是受李侗的影響。他說：

舊嘗看《正蒙》，李甚不許。<sup>97</sup>

<sup>94</sup> 宋·朱熹：〈程欽國〉，陳俊民校編：《朱子文集》別集，卷3，頁5147。又見《朱程問答》，卷1，頁4。此信陳來先生與東景南先生皆編年於宋高宗紹興三十年。陳來：《朱子書信編年考證》，頁21。東景南：《朱熹年譜長編》，卷上，頁246。

<sup>95</sup> 明·程資：《朱程問答》，卷1，頁21。

<sup>96</sup> 同前註，頁26。

<sup>97</sup> 清·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冊7，卷103，頁2602。

李先生云：「橫渠說，不須看。非是不是，只是恐先入了費力。」<sup>98</sup>可見重視靜中體驗未發的李侗，深怕朱熹一旦鑽研張載《正蒙》，就走偏了方向，所以勸告他不用多費心力。然而朱熹後來跳脫李侗的視角，從批判佛道思想的觀點肯定張載《正蒙》的貢獻。並且，淳熙二年（1175）朱熹開始編定的《近思錄》，其中收錄了《正蒙》12篇共31章的內容，可說是較有系統地解說《正蒙》的發端。<sup>99</sup>

雖然朱熹早年對《正蒙》的態度並不積極，但是對〈西銘〉卻是相當關注。在《朱程問答》中，收錄了一通朱熹與程洵討論〈西銘〉的書信。根據程資依照家中所藏先世遺墨的考定，程洵與朱熹討論〈西銘〉的時間，在宋孝宗乾道三年（1167），<sup>100</sup>程資將這篇「別楮」命名為〈西銘疑義〉。至於程洵與朱熹的討論方式，正如呂柟所言，以「解釋訓詁居多」，<sup>101</sup>然而這也正可以反映出朱熹早期對〈西銘〉的見解，以及與程洵思想的差異。

首先，對於「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的解說，程洵的觀點是：

《西銘》之所謂「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洵竊謂天地之體大矣，而吾之體與之同其大；天地之性正矣，而吾之性與之同其正。「塞」與「塞于天地之間」之「塞」同，「帥」與「志氣之帥」之「帥」同。<sup>102</sup>

他著重於人與天地萬物同體，並且關注體用不二這一面。同時他也指出，張載所說之「塞」與「帥」的訓詁，要根據《孟子·盡心》「塞於天地之間」以及

<sup>98</sup> 同前註。

<sup>99</sup> 張金蘭：〈朱熹與張載《正蒙》〉，《中國哲學史》2010年01期，頁54。

<sup>100</sup> 明·程資：《朱程問答》，卷1，頁15。

<sup>101</sup> 明·呂柟：〈朱程問答序一〉，清·程荅照等：《韓溪程氏梅山支譜》，卷1，頁51。

<sup>102</sup> 明·程資：《朱程問答》，卷1，頁22-23。

「志氣之帥」來解釋。但是朱熹的回答則是：

清明博厚，克塞彌滿者，天地之塞，而吾之所以為體。主宰運行，流而不息者，天地之帥，而吾之所以為性。<sup>103</sup>

朱熹的回答的重點則是區別體與用：天地為體（性），而吾為用，此外，朱熹回應程洵對「天地之塞」的解說時，所使用的語彙主要是從《中庸》論「至誠」的「博厚則高明」，以及程顥所說「中庸之言，放之則彌滿六合」而來。<sup>104</sup>但是在《朱子語類》中，朱熹晚年也轉而引用《孟子》解釋，他說：

「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塞，如孟子說：「塞乎天地之間」。塞只是氣。吾之體即天地之氣。帥是主宰，乃天地之常理也。吾之性即天地之理。<sup>105</sup>

相較於朱熹說法前後的轉變，可以看出他晚年在「塞」字的訓詁上，凸顯了「氣」的概念，主張「吾之體即天地之氣」，正如朱熹回應黃道夫所說：「充滿乎天地之間莫非氣，而吾所得以為形骸者，皆此氣耳」，<sup>106</sup>並且「吾之性即天地之理」，強調天地之體用即吾之體用。由此可見，朱熹解說「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這句話，早年與晚年的重點不同。

其次，人物之異也是朱熹和程洵討論的重點。張載〈西銘〉言及「物吾與也」，將人與物視為等同。這點讓程洵感到困惑。他問朱熹說：

「惟天地，萬物父母；惟人，萬物之靈。」天之待人與物固不同，則聖人之待人，與物亦宜異，今「物吾與也」，其義如何？<sup>107</sup>

朱熹的解說是：

<sup>103</sup> 同前註，頁 23。

<sup>104</sup> 宋·朱熹：《中庸輯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冊 198，卷上，頁 1。

<sup>105</sup>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冊 7，卷 98，頁 2520。

<sup>106</sup> 宋·朱熹：〈答黃道夫二〉，陳俊民校編：《朱子文集》，卷 58，頁 2799。

<sup>107</sup> 明·程資：《朱程問答》，卷 1，頁 23。

以天地為父母，則人類皆吾兄弟，庶物皆吾等儕，其親疎固不同矣。此之謂分殊。<sup>108</sup>

朱熹認為以天地為父母的觀點來看，所有的人類就像是兄弟，萬物與人也是同類，但是人之所以與萬物不同，是與天地的親疏關係不同，這就是朱熹所謂「分殊」的概念，這是他橫向的理解。然而若是把「分殊」的關係，當成人之所以有別於物的原因，朱熹是不贊同的。他說：

天之生成萬物，人得其秀而最靈，謂之愛人甚於愛物可也。然謂愛人甚於物，故畀我以至善之性，則是天地先有愛人之心，而後畀之以性也。此類亦謂理自如是耳。天非有愛欲之心也，以此意窺測天理則誤矣。凡經、傳之言天，類如此。<sup>109</sup>

朱熹認為天對待人與物，有親疏遠近的差別，這是理當如此。雖然表面上看來，天愛人甚於愛物，並不表示天先有了愛人的想法，然後給予人至善之性，使其與物有所不同。這就無法展現天理廓然大公的性質，反而顯其愛欲之心的私意。朱熹認為這不符合經傳中對「天」的理解。

以上就著《朱程問答》所提供的線索，釐清朱熹書信的繫年、林用中與朱熹交往，以及朱熹早年對張載《正蒙》和〈西銘〉的觀點。雖然這些問題，無礙於對朱熹思想體系的理解，但是能讓朱熹早年的交往與思想狀況，更加清晰，由此可見《朱程問答》仍具有考定朱熹生平、交遊以及思想內容的價值。

## 五、結 論

藉由考察《朱程問答》的編定、影響和考訂作用，對於理解朱子學在明清時代的發展，以及現今朱子學的研究，能提供以下三方面的助益。首先，從《朱程問答》的編纂背景與過程，可以看見朱子學在明代發揮著凝聚家族文化

<sup>108</sup> 同前註，頁 23。

<sup>109</sup> 同前註，頁 25。

的關鍵作用，這可以說是徽州地區重視家學傳統的延續。<sup>110</sup> 明代永樂年間，《四書五經大全》成為科舉考試的主要內容，同時也表示朱子學成為官方所提倡的學術正統。明憲宗時期，身居要津的程敏政率領徽州程氏四十四房，共同編定《新安程氏統宗世譜》，並且刻意標榜朱子學為家學。這個行動，影響徽州韓溪程孟河等人，開始蒐集整理其先人與朱熹相關之文獻，最後由程資整理刊刻，其目的就在於尊祖、敬宗和睦族。《朱程問答》也就在這樣的背景下，經由程資之手而面世。其中身為養子的程資，貢獻最大。其次，《朱程問答》還未編定完成之前，在明代就受到程瞳的重視，這對於程洵傳記的重建，並且勾勒徽州地區朱子學一脈相傳的情節，都有助益；《朱程問答》刊刻之後，在清代則受到朱子學者夏忻的關注，他藉由其中的資料，重新檢證王懋竑《朱子年譜》的觀點，確立其最關鍵的學說——「朱學三變」之說。雖然其中某些的觀點，仍有繼續討論的空間，但是《朱程問答》所保存的資料，的確提供一些線索，能夠更細緻地梳理朱熹的生平。第三，《朱程問答》所保存的書信，較目前《朱子文集》中的內容，更加完整。根據《朱程問答》的編排和體例，可以釐清目前朱熹與程洵書信的繫年問題。同時，也能釐清林用中任職於朱熹家塾的時間，以及葉仁的事蹟。此外，《朱程問答》的佚文也能提供證據，更細緻地理解朱熹早年對張載的《正蒙》的觀點，以及詮釋〈西銘〉的不同視角。

藉由《朱程問答》的成書、刊刻與影響，可以看見朱熹和程洵之書信被保存和利用的軌跡，原本是私人的信件，在元朝和明朝成為程氏家族標榜家學的關鍵文獻，進而在程瞳和夏忻手中，轉變為明和清代建構徽州朱子學系譜的重要資料。由此可見，地方家族在保存文獻上的角色，不容忽視。此外，《朱程問答》保存朱熹信件的原始樣貌，這對於長期使用後人所刪定之《朱子文集》的研究者而言，不啻為一個重要的提醒：朱熹原始的信件，與現今所看到的內

---

<sup>110</sup> 關於宋元時期，徽州地區發展家學傳統的問題，請參見史甄陶：《家學、經學和朱子學——以徽州學者胡一桂、胡炳文和陳櫟為中心》，頁 36-48、83-98、130-150。

容，並不完全一致。<sup>111</sup> 特別是《朱子文集》當中，刪除了記錄他個人生活的一面。<sup>112</sup> 又如在目前《朱子文集》未收錄的信件中，也保存了朱熹對他兒子們的掛慮和安排，<sup>113</sup> 以及對徽州親屬們的關懷。<sup>114</sup> 這些記載看似與學術無關，但是若要從歷史的角度了解朱熹在私人領域中的心態，這些記錄仍有值得留意之處。

（責任校對：方韻慈）

<sup>111</sup> 淺見洋二和徐力恆的研究都已經指出，南宋人在編輯作品成集時，會將書信加以刪減或修改，特別是有關作品產生現場之情況，而將內容呈現為整齊中立的表現。淺見洋二藉由南宋史容《山谷外集詩注》的研究作為例證。（日）淺見洋二：〈黃庭堅詩注的形成與黃芻《山谷年譜》——以真跡及石刻的利用為中心〉，《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 51 卷第 2 期（2011 年 3 月），頁 30-31；徐力恆則是藉由米芾的手跡和法帖，還原米芾書札和詩作的原初型態，並與南宋岳珂所編的《寶晉英光集》對照，證明岳珂編訂米芾的遺著時，大多留下詩句，而將可看作是書札一部分的序言刪去。徐力恆：〈米芾書札管窺——以書信文化和書法為主的考察〉，《北大史學》第 20 輯，待刊。

<sup>112</sup> 例如朱熹曾向程洵訴說：「熹頓首，一別數年，懷想無已，貧病多，故不時寄書，亦恨久不聞聲問也。祖義來，并得兩書，皆前所寄，讀之，知問大概，足以慰情。又蒙賜書，得知近日諸況安佳，尤以為喜也。然三書皆云多病，不知果何如？熹兩年來疾病百出，近日證狀殊惡，深可慮耳。」見明·程資：《朱程問答》，卷 1，頁 3。此段文字出現在「往年誤欲作文」之前，宋·朱熹：〈程欽國〉，陳俊民校編：《朱子文集》別集，卷 3，頁 5146。又如朱熹在信中向程洵言及其父朱松的文集事宜，他說：「先集只寫得一本，旦夕別寫附去。先人不及著書，此集大抵只是應酬之文。吾弟方務學以求道，則亦所急也，如何。熹再啟。」明·程資：《朱程問答》，卷 1，頁 13。此段文字在朱熹〈答程允夫三〉：「因筆及此，似傷直矣，然不直則道不見，吾弟察之，幸甚」之後，見陳俊民校編：《朱子文集》，卷 41，頁 1769。

<sup>113</sup> 朱熹在信中言及家庭的情況，說：「熹兩兒，大者名塾，小者名埜，大者稍能讀書，尚未能作文，小者皆不能問也。」見明·程資：《朱程問答》，卷 1，頁 15。或者提到：「大兒在家讀書無頭緒，已遣往婺州呂伯恭處，次者只在家，亦年二十矣，殊無孔竅，甚可慮。有一小者方五歲，將來卻似可教也。」同前書，卷 2，頁 18。

<sup>114</sup> 明代程資提到朱熹在程洵之父程鼎過世之後，曾寫給程洵四封書信、二通內帖和二通別楮，以示慰問之意，請見本論文註 65 引文。但目前這些書信，被收錄在《朱子文集》中的只有一封書信（〈答程允夫五〉，陳俊民校編：《朱子文集》，卷 41，頁 1777-1778）、一通內帖（〈程允夫四〉，陳俊民校編：《朱子文集》別集，卷 3，頁 5148）和一通別楮（〈程允夫五〉，陳俊民校編：《朱子文集》別集，卷 3，頁 5148-5149），其餘書信，均被保存在《朱程問答》卷 1 中。

## 引用書目

### 一、傳統文獻

- 宋·朱熹：《中庸輯略》，《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冊198。
- \* 宋·朱熹著，陳俊民校編：《朱子文集》，臺北：德富文教基金會，2000年。
- \* 宋·程洵：《克庵先生尊德性齋小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
- \*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北京：中華書局，1994年。
- 宋·李心傳：《道命錄》，《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冊517。
- 宋·滄州樵叟：《慶元黨禁》，板橋：藝文印書館，1966年。
- \* 明·程資：《朱程問答》，現藏中國國家圖書館。
- \* 明·程瞳：《新安學繫錄》，合肥：黃山書社，2006年。
- 明·范涑修、章潢纂：《新修南昌府志》，北京：書目文獻出版社，1992年，明萬曆十六年刻本。
- 明·程敏政：《新安文獻志》，合肥：黃山書社，2004年。
- 明·程敏政：《篁墩文集》，《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83年，冊1252、1253。
- \* 清·夏忻：《述朱質疑》，《續修四庫全書》，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冊952。
- \* 清·程蓉照等纂修：《韓溪程氏梅山支譜》，現藏上海圖書館。
- 清·王懋竑撰，何忠禮點校：《朱子年譜考異》，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
- 清·吳坤修：《（光緒）重修安徽通志》，北京：北京圖書館，2004年。
- 葛韻芬：《（民國）重修婺源縣志》，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6年，民國十四年刻本。



(韓)尹胄夏：《考亭舉隅》，此書收於韓國慶尚大學圖書館文泉閣「南冥學古文獻」。網址：[http://nmh.gsnu.ac.kr/VIEWER/viewer.jsp?nodeid=GAA2\\_ZZZL\\_GJG301&type=02](http://nmh.gsnu.ac.kr/VIEWER/viewer.jsp?nodeid=GAA2_ZZZL_GJG301&type=02)

## 二、近人論著

- 丁福保：《佛學大辭典》。網址：<http://buddhaspace.org/dict/dfb/data/%25E5%2591%25A8%25E7%25A5%25A5.html>。
- 王奕然：〈析論朱子和弟子程洵思想的異同——以兩人對蘇學的看法為討論核心〉，《東華人文學報》第 21 期（2012 年 7 月）。
- 王鶴鳴：《中國家譜通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年。
- \* 史甄陶：《家學、經學和朱子學——以元代學者胡一桂、胡炳文和陳櫟為中心》，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3 年。
- \* 束景南：《朱熹年譜長編》，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01 年。
- 吳麗娛：〈再論復書與別紙〉，《燕京學報》新 13 期（2002 年 11 月）。
- 李 強：〈溝通與認同：歐陽修書簡中的文人世界〉，《史林》2013 年 01 期。
- 東英壽：〈新見歐陽修書簡考〉，《東華漢學》第 15 期（2012 年 6 月）。
- 洪本健：〈歐陽修《書簡》略論〉，《福州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14 年 05 期。
- 徐力恆：〈米芾書札管窺——以書信文化和書法為主的考察〉，《北大史學》第 20 輯，待刊。
- 涂美雲：《朱熹論三蘇之學》，臺北：秀威資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05 年。
- 常建華：〈程敏政《新安程氏統宗世譜》譜學問題初探〉，《河北學刊》第 25 卷第 6 期（2005 年 11 月）。
- \* 陳 來：《朱子書信編年考證》，北京：三聯書店，2007 年。
- 陳榮捷：《朱子門人》，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82 年。
- 陳 靜：〈「別紙」考釋〉，《敦煌學輯刊》1999 年 01 期（總第 35 期）。
- 張金蘭：〈朱熹與張載《正蒙》〉，《中國哲學史》2010 年 01 期。

- 粟品孝：《朱熹與宋代蜀學》，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8年。
- 趙效宣：《宋代驛站制度》，臺北：聯經事業出版公司，1983年。
- 歐明俊：〈從新發現的96通書簡看歐陽修的日常生活〉，《武漢大學學報》2012年03期。
- 錢穆：《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90年。
- （日）淺見洋二：〈黃庭堅詩注的形成與黃芻《山谷年譜》——以真跡及石刻的利用為中心〉，《中山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第51卷第2期（2011年3月）。
- （日）Ichiki Tsuyuhiko, “The Value of Zhu Xi's Letters as Historical Material: A Viewpoint from Research into the History of Thought.” in *the Study of Song Histo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edited by the Research Group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in Song China. Tokyo: Ando Satsu Kogyosha, 2000, pp.129-153.
- Lik Hang Tsui (徐力恆), “Writing Letters in Song China (960-1279): A Study of its Political, Social, and Cultural Uses.” D.Phil. diss., University of Oxford, 2015.
- （說明：書目前標示\*號者，已列入 Selected Bibliography）

## Selected Bibliography

- Chen, L. (2007). *Zhu zi shu xing bian nian kao zheng* [A verified chronicle of Zhu Xi's letters]. Beijing: SDX Joint.
- Cheng, R.-Zh., et al. (Eds.). (n.d.). *Wu yuan han xi cheng shi mei shan zhi pu* [A genealogy of Cheng Mei-Shan's family in Hanxi, Wuyuan]. Shanghai Library, Shanghai.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in the Qing dynasty)
- Cheng, T. (2006). *Xin an xue xi lu* [The intellectual lineage of Xin'an]. Hefei: Huang Shan.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in the Ming dynasty)
- Cheng, X. (1995). *Zun de xing zhai ji* [A collection of Cheng Xun's works].

- 
-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in the Song dynasty)
- Cheng, Z. (n.d.). *Zhu cheng wen da* [Questions and answers between Zhu Xi and Cheng Xun]. National Library of China, Beijing.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in the Ming dynasty)
- Li, J.-D. (Ed.). (1994). *Zhu zi yu lei* [Dialogues between Zhu Xi and his students]. Beijing: Zhonghua.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in the Song dynasty)
- Shi, Zh.-T. (2013). *Jia xue jing xue he zhu zi xue yi yuan dai xue zhe hu yi gui hu bing wen he chen li wei zhong xin* [Paternal teaching, classics teaching and Zhu Zi's studies: Focusing on Yuan dynasty scholars Hu Yi-Gui, Hu Bing-Wen, and Chen Li]. Shanghai: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 Shu, J.-N. (2001). *Zhu xi nian pu chang bian* [The first draft of a chronicle of Zhu Xi's life]. Shanghai: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 Xia, X. (1995). *Shu zhu zhi yi* [A discussion of questions about Zhu Xi]. Shanghai: Shanghai Ancient Books.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in the Qing dynasty)
- Zhu, X. (2000). *Zhu zi wen ji* [A collection of Zhu Xi's articles] (Chen J.-M., Ed.). Taipei: Defu Foundation. (Original work published in the Song dynasty)

